

当年沈昌文先生主持《读书》杂志,他有一句话让我铭记:“《读书》不是书评杂志。”那是什么呢?他在为“书趣文丛”题写广告语时,写出四句话,点破了书话写作的真谛:“书人的心境,书外的故事,书里的风景,书中的情趣”。

## 另一种书话

俞晓群



我书房中的图书构成,最大的板块是中国古代典籍。你可能会想:一个学数学的人,后来的职业又是出版人,何以如此好古呢?首先是受家庭的影响,我记忆中的时候,父亲闲暇时总是捧着一本历史书、旧小说在读。我中学毕业后,离开家庭去农村劳动,临行前父亲送给我三本书,其中一册王稼祥《史记选》最让我难忘,引发了我对旧典的兴趣。其次是早年读书环境不好,我们那代人的文化基础远不及老辈们扎实。后来我有了数学专业学习的机会,但当你参加工作之后,自身的弱项很快暴露出来,所谓“老三样”的缺失:毛笔字、繁体字、文言文,工作中提笔忘字、词不达意、语言贫乏,这些都不是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可以替代或弥补的。关键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后辈们又赶了上来,他们遇上改革开放的时代,受到较好的教育,整体的文化素质越来越好。所以几十年间,我始终有一种先天不足的缺憾与危机感,一直告诫自己要努力多读书,补上缺失的知识。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对旧典的敬重与偏爱,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我喜欢古籍也不是泛泛而读,有一条主线一直引领着我的存书与读书的路径。那就是我从数学系毕业,最初转身进入人文领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后来受到几位前辈的影响,开始了解中国数学史,转而研读数学著作,买了许多相关的书,自己也写过几本小书《古数学钩沉》《数学探秘》《数与数术札记》,接着又研读“廿五史”《五行志》及《灵征志》《灾异志》。不过此项阅读让我吃尽了苦头,苦从何来呢?一是这个门类的书颇为艰深晦涩,古今注说又比较少,读懂都难,研究更是自讨苦吃了。二是前面谈到,我的知识结构存在缺陷,古文不精,数术不通,只有想办法补救自己的不足。比如案头上除了原著之外,我还购买简体版、白话版的相关书籍,有中华书局简体版“二十四史”,岳麓书社《古典名著今译读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古代经典今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简体字版《十三经注疏》,对照学习,解决阅读的困难。那么就版别而论,我书房中的古籍图书,哪家出版社的书最多呢?首推中华书局,大书如“二十五史”,还有《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小书如史料笔记、古体小说、新编诸子集成等。此外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中国书店、岳麓书社的书,从新著到影印版的书,我随用随收,随收随选,越积越多。读它们,由最初的求知欲望,逐渐变成一种精神享受。

所谓享受大体有两个指向,一是承继中国旧式文人的传统,坚持做读书笔记,它们不同于当代主流的学术研究,不同于西式的书籍史,不受现代学科设置的限制,可以避免现行教育体制的干扰。说白了,如此读书较少功利性,更强调阅读者的主体意识,注重个人兴趣。二是走唐钱《晦庵书话》、郑振铎《西谛书话》的路子,写一写书话。但对于书话,我近来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缘于我收存书话、准书话极多,闲来翻看也最多,由此总结出书话写作的四忌:一忌图书简介,二忌书摘摘抄,三忌空洞无物,四忌肆意八卦。当年沈昌文先生主持《读书》杂志,他有一句话让我铭记:“《读书》不是书评杂志。”那是什么呢?他在为“书趣文丛”题写广告语时,写出四句话,点破了书话写作的真谛:“书人的心境,书外的故事,书里的风景,书中的情趣”。书话好写又不好写,写好了不易,写得好看,有价值更不易。不同知识背景的人,写出书话也会很不相同。因此阅读书话时,需要多一点细心,加一点小心。

不过阅读中,我也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有时好看的书话,好听的故事,并不在号称书话的著作中;有时不称书话的著作,可能更有书话的价值与趣味。近读徐俊先生《翠微却顾集》,使我的感觉愈发强烈。阅读之中,我有了两点评价:一是学术性很强,二是非常好看。先说其一,中华书局的前辈程毅中先生称赞此书:为专家学者补写外传,是艺文志的大序,是中华书局局长编的资料。此言不虚,深一步还有两点难得:首先是文如其人,只有人品学品端正的人,才能写出如此温良恭俭让的忆旧文

章。正如程先生评价徐俊三句话:“对历史的尊重,对文献的敬畏,对前贤的追慕。”其次是道不虚行,中华书局乃中国书界的百年圣地之一,身处其中,使人有了与环境结合的可能性。徐俊说:“在一个悠久、优秀的传统中工作、生活,是幸运的,幸福的,我们是这个传统

有时好看的书话,好听的故事,并不在号称书话的著作中;有时不称书话的著作,可能更有书话的价值与趣味。

的一部分,我们承继传统,又为传统增添新的价值、新的色彩,因而也放大和延长了我们自身。”此说情理交融,我深以为然。有这样的治学原则,更兼徐俊学术功底深厚,融通规范,文字严谨,自然会提升著作的学术价值。

再说其次,徐俊善写文章,文风质朴,语言谦逊。书中记述那么多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颇为难得,却没有一丝夸张的口气。有言“中华风度”,代表人物有杨伯峻、周振甫、赵守俨、傅璇琮,徐俊作为一任掌门人,深得其精髓,落笔可信、可读、可亲。如果我们将他写的一些故事归于书话类,又会产生更好的阅读感受。比如他说,1949年后中华书局校史,有三位最重要的人物:一是顾颉刚,他从1954年按照毛泽东指示出任《资治通鉴》总校对,组织12位专家点校,同时开始点校《史记》,成为修订“二十四史”总其成的人物。二是宋文彬,他在1958年9月13日从杭州调入中华书局,肩负着右派身份,成为点校“二十四史”的第一任责任编辑,留下“上午劈柴,下午校史”的故事。2015年,宋先生孙辈将家中珍藏书画拍卖,所得1400万元全部捐给中华书局,建立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三是赵守俨,他是《清史稿》总修撰赵尔巽的后人,1958年从商务印书馆调入中华书局,成为点校“二十

四史”的核心人物,档案里留下大量毛笔手书,“翠微校史”第一份档案材料也是他写的。徐俊评价:“案牍公文书法能达到赵先生水平,后无来者。”

徐俊讲述的人物还有很多,再略说二位:一是王仲闻先生,他是王国维次子,长相酷似父亲,沈玉成称他“子之于父,如明翻宋本,唐临晋帖”。他中学毕业即工作,但家学深厚,精熟唐宋文献,常以宋人自许。由于政治原因,他只能在中华书局做临时编辑。1959年4月《全唐诗》点校说明,属名“王全”,实为王仲闻、傅璇琮。《全宋词》重印七次都没有他的署名,直到出简体字版,才加上“王仲闻补订”。二是翠微校史,有“南王北唐”之说,此中南指南朝五史,北指北朝四史,王指章太炎弟子王仲举,唐指唐长孺。单说王仲举的故事,1986年他在书房中去世,周一良挽联:“章门高弟一生游心文与史,吾道先驱两部遗编晋到唐。”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将书房锁了五年未动,将王先生的手稿《宋书校勘记长编》始终安放不动,直到2008年交中华书局影印出版。

还有一些难得的书话,如蔡美彪先生是起草点校“二十四史”第一份会议纪要的执笔者,他晚年将自己珍藏的《元典章》赠送给中华书局。顾颉刚曾向周扬推荐三位学生刘起钰、黄永年、王华煦,请他们来京帮助校史。张政烺曾被任命为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但未到任。陈寅恪的著作未能在中华书局出版,事关杨荣国、金性尧。还有汪篁与《唐六典》,王先谦与《新旧唐书合注》,周振甫与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的审读交流云云。

徐俊承继传统,毛笔字写得极好,清新自在,不着匠气。我曾向他求字,他录汪曾祺句:“往事思如细雨,旧书重读似春潮。”徐俊说当初请启功先生看他写的字“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启功委婉指出其中“问”字草法错误,还取出拓本《杜甫阁帖》让徐俊带回去练习。而徐俊看启功写字,说出两点惊奇:一是慢,包括略带雪白的出锋竖笔;二是随时补笔,甚至重复已写的笔道,无论粗细,每补都精准到位,真令人叹服。



### 细节里的温度

王铁军

#### 《传奇发明史》

这是一部关于从工具到美人机器人等各种伟大发明及其创造者的传奇故事,全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七个单元,从史前时代一路讲到21世纪的当下与未来。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更像是一本“发明简史”,将每一项发明浓缩成一个小小的“知识卡片”,或许不够详细、全面,但却点出了每一个巧思诞生的曲折过程和重要意义。

全书信息量大,包含很多有趣的知识点。比如,科学定律的发现一定在实际装置的发明之前吗?发明是阴差阳错而诞生的吗?对于每一个发明,文末都列出与之关联的内容,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兴趣去翻阅。

除了介绍各种发明设计的过程和重要的事件之外,书中还有深刻的思考。比如,谈到19世纪各种各样的机器横空出世之时,作者不无忧虑地说:“并非所有的机器都能抬举人;这场欣欣向荣、备受吹捧的‘进步’并未并未让每一个人受益,还可能会给所有人带来危害。”

#### 《路遥的时间：见证路遥最后的日子》

《路遥的时间》既是关于路遥的传记,也是作者航宇的回忆录,只聚焦路遥一个人的回忆录。在这本书里,读者遇见一个因对亲人、对大地、对文学充满深情而拥有无限可能的路遥。如果没有这些深情,路遥何以写出《人生》《平凡的世界》等经典著作?如果上天对他足够深情,读者能够认识的注定是一个更加丰富、圆满、完整的路遥!这是注定没有结局的期待,深感遗憾的同时,便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航宇写作此书的意义。

路遥属于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更属于广袤质朴的陕北大地。这本见证路遥最后日子的书,再现的不仅是文学中的路遥,也是生活中的路遥。航宇不是研究者,而是亲历者、陪伴者,这便注定了《路遥的时间》是一册有体温的书。有别于其他路遥传记作品的是,《路遥的时间》截取的角度是独特的,它记录的是路遥生命的最后时光。航宇与别的路遥研究者不同的是,他陪伴路遥走过从荣获茅盾文学奖到病逝西安的那段光阴。读过之后,读者更会心生无尽的慨叹。

#### 《好玩儿的大师》

这本书向读者展现学术大师赵元任的另一面,他仿佛是一位穿越到一百年前的当代人,爱以自拍记录生活,爱以趣味追寻学术。在那千余幅的照片里,我们见证了时代的跌宕起伏,也结识了一位幽默、细腻、沉浸在日常生活中的天才大师。这是一套前所未见的影记,透过那些静默的黑白影像,我们仿佛跟随一位学术大师游走于百年中国的历史现场。千余幅照片,跨越百年,从未中断,仿佛是一场世纪直播。

这些照片由一位学术大师亲自掌镜,记录生活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中国摄影史上亦是独一无二。他既是亲历者,也是记录者、观察者。庚款留学、草创中研院、抗战内迁等等,那些与时代共命运的经历与现场,极为珍贵。胡适、梅贻琦、傅斯年等学术名家,尽在眼前。这些照片赵先生自己是非常珍视的,所以1937年抗战爆发中研院南迁时,赵先生把日记和照片寄给朋友保管,这批珍贵的资料才得以避免遭战火毁灭而保留下来。如果没有他的这份细心,今日读者是没有读到这本书的运气的。

## 透过历史名城读懂中国世遗保护理念

王岩嶸



### 城市是一种“活着的”世界遗产

从世界范围看,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城市一般都历史悠久,如意大利的威尼斯、老树的琅勃拉邦等。

耐人寻味的是很多进入这一名录的城市并不以整个城市的形式进入,更多的是其城区中的某个历史地段。比如澳门的历史城区,法国巴黎的塞纳河畔等。可见进入这一名录的标准之精准和严格。

总体来看,这些世界遗产地的建筑和城市格局能够代表所在地的文化特征或城市规划思想,并且在历史上或者现存城市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同时其建筑和城市格局的保存状况能够清晰地体现出这种文化特性。

更重要的是这些世界遗产地现在依然是城市中的生活场所,有些甚至是一个城市重要功能的组成部分。所以说这些世界遗产地是一种容纳着城市日常生活的、依然在生长、变化中的活态文化遗产。这也是它的独特价值——具有日常生活属性。

在城市遗产中,我们可以发现生动的生活场景。在其中我们甚至可以探访到一些在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段已经消逝了的生活方式,找到一些有关整座城市生活变迁的痕迹。这种生活场景与遗产地传统的建筑和城市空间相互依存共生,代表着一种传统的人类居住地的杰出范例。

### 独树一帜的中国历史城市

我国的历史古城遍布全国各地,数



量之多、特色之鲜明举世闻名。这些城市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城市格局,众多的名胜古迹和乡土建筑,体现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独树一帜。

史料记载,夏代已有城市的出现。考古发现,周代都城镐京(今西安附近)已是按一定规划建设城市。

唐代两都——长安(今西安)与洛阳,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其规划布局对后来中国及东亚地区的很多城市都有深远的影响。

明清两代定都北京,明代在元代的基础上增筑都城,其布局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的完整布局,仿效了《周礼》中记述的周代王城的布局与制度。

今天,在国际上有世界遗产名录,100多个城市进入其中,在中国也有自己的相关名录——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城。截至2022年1月11日,已经有140座城市进入这一名单,国家对这些城市的文化遗产进行了重点保护。

中国的历史城市可分为四种类型:古都型,如北京、西安、洛阳等地。它们具有层次分明的城郭,严谨有序的城市中轴线,有机活泼的水体,平直整齐的城市路网,起伏有致的城市天际线,丰富多彩的城市景观,主次分明的城市色彩等。

地方特色和民族文化型,如苏州、大理、喀什等地。这些地方具有物质形态上的历史氛围感和民族特征,可以折射出某一时代或地域的政治、文化、经济等诸方面的内涵,显示出很强的历史特征和文化遗产性。

近现代风貌型,如上海、延安、遵义等地。这些地方有的历史较短,不到200年,留有大量的西方风格建筑群,如上海在文艺、建筑等方面,存在着一种被称为“海派”的文化。遵义和延安,我党当年在遵义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遵义会议”;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100多处革命文物记载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这两座城市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

特殊职能型,如景德镇、自贡等地。这些地方具有与其他城市不同的特点,在历史上某些职能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些城市的象征。如景德镇有“瓷都”之称,自贡有“盐都”之称。

### 特色保护理念给更多中国历史城市提供机会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世界遗产城市保护显得有些不同,因为这是一种在持续变化中的保护,所以会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

发展和变化是城市永恒的主题,在城市日益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的今天,特别是在中国,世界遗产城市的保护必须直面城市发展的挑战,这

样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对一个城市而言,成为世界遗产,会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更大机会。但城市要发展,城市中的世界遗产区也需要融入城市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世界遗产城市面临的挑战来自城市更新与城市开发,如城市面貌的改变。

人们需要更新城市设施,提升生活品质,这些建设性工作都涉及对遗产地空间环境的改变。这样的行为如果不恰当,将直接对世界遗产的价值造成负面的影响,甚至是不可逆的破坏。

世界遗产城市的保护不是将保护的客体进行固化,而是管理好遗产地空间变化的过程,变化的节奏和变化的方向,在适应发展需要的同时留存好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我们需要做的是保护好遗产的完整性、真实性。

《世界遗产在中国——历史城市》一书揭示出,中国的世界遗产城市保护正在遵循“整体保护,和谐发展”“保护活态的世界遗产”等理念进行。

“保护古城,建设新城”是中国的具体实践,平遥与丽江都进行了新旧城分开发展的策略,这种策略避免了“千城一面”的命运,有效地保存了独特而又完整的古城风貌。

种种对历史城市保护的创造性理念,也必然会为更多的中国历史城市提供思路,在今后必定有更多的中国历史城市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之中,如已经进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的福州“三坊七巷”。

